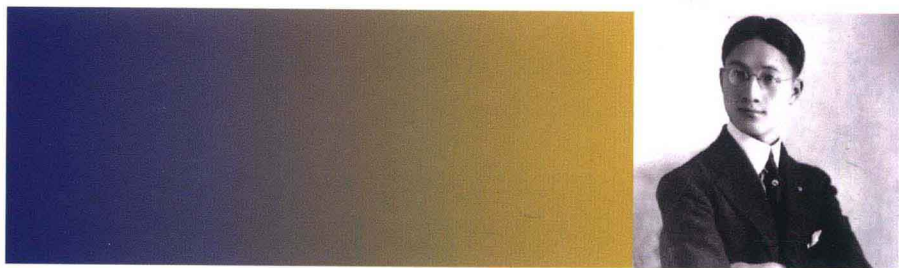


系统论述徐志摩人格体系与文化意义的第一本专著

徐志摩与中西文化



胡建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徐志摩与中西文化

胡建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摘 要

本书从分析“徐志摩现象”入手,阐述了徐志摩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思想,把徐志摩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思想启蒙和审美文化启蒙两条主线中考察,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对照,论述了徐志摩研究的文学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本书系统研究了徐志摩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个性化人格的形成历程和影响要素,分析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全面论述了徐志摩理想主义人格体系,从生命理想、自然人格、社会政治思想、爱情与交友的分析中,论述了徐志摩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系及其思想人格的超前性和悲剧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与中西文化/胡建军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艺术人文丛书)

ISBN 978-7-313-09842-9

I. 徐... II. 胡... III. ①徐志摩(1896~1931)—人物研究 ②比较文化—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825.6 ②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8968 号

徐志摩与中西文化

胡建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 字数:254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9842-9/K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621873

前言

年轻时我喜欢读诗,偶尔也写几句诗,算个多愁善感的“志摩族”。1991年在本科毕业之际,我曾在自己的留言册上写下过“在人生的海洋里浪漫畅游”的自勉之语。当时我就知道我的“幼稚”,在实际人生中“浪漫”谈何容易?持续那“浪漫的人生”又是何其艰难和侥幸的事!但我至今还是执着地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志摩那样多几分“浪漫”的色彩。

1999年至2002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张德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徐志摩研究”这个方向,导师很支持我的选择。也许在他看来,我的现代文学根基不深,学术涉猎少而芜杂,研究文学思潮、社团或复杂的文学现象功力不够,而研究某一个作家作品对我来说还是能胜任的。而在我这方面,真实的情况是我那时完全被“浪漫的志摩”吸引了,他的作品、他的人生,特别是他的人格精神强烈地吸引了我,对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我的一种激励,一种人生目标。那段时光,我觉得我离志摩很近,我的生活好不快意:一方面导师宽容,允许我随便读书,少量选课,轻松惬意;同时我在饱受感情磨难之后终于遇到了我的那一半,在丽娃河畔的三年生活始终点染无忧无虑、活泼明丽的色彩,既有时得新知的快乐,也有感情踏实的满足,经济上也没有压力。那时,徐志摩最合我的胃口,丽娃河就是我的康桥。

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也随着信息增多和视野的拓展,我对徐志摩的认识开始逐渐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反思结合起来,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我离志摩的精神与生活距离何其遥远,当代中国人中也许再不会出现“志摩”那样的人物!于是那轻盈明快的徐志摩调子背后的沉重与沉痛越发强烈起来。我开始把徐志摩研究作为我在沉重的历史反思和社会忧虑的内心重压下得以喘息的依靠。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认为徐志摩研究绝非一般的个案研究,徐志摩这个知识分子的全部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越发觉得当代中国社会虽然经济长足进步,但在文化方面实在显出衰气。作为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既有愧于现代时期的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徐志摩那一代真正的精英,又将有愧于后世和历史。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不配称作“知识分子”,我所见的很多知识者投机钻营、猥琐自私,要么成为“犬儒”,要么无异于“市井小人”,哪有什么高贵的精神境界?!当代知识者缺乏的是徐志摩那真诚的人生信仰和超越自我生存的自由意志与精神追求,缺乏的是道德与公义的担当。面对社会的信仰缺失、生态灾难、道德缺



失、社会失衡和严重腐败,我们没有勇气甚至浑浑噩噩,既无力在历史过往中寻找经验教训,也无力在人类共有的文明中发现精神资源;既无力于创新理论,又无力于干预现实,只能可耻地随波逐流或隐遁桃源。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人格”是提不起来的,这是我在研究徐志摩的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忧虑与自责。不管怎样,志摩善于“歌唱”而不像鲁迅善于“呐喊”,从志摩身上我所得到的启示,就是扎扎实实开展审美启蒙,用艺术呼唤良知,用艺术改良道德,用艺术启迪和拯救民众的精神,在中西互动中重建当代中华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复兴。

眼前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当年审阅论文或参加答辩的有徐中玉、陈鸣树、陈思和、吴立昌、吴中杰、吴俊、殷国明等先生。为了向读者说明这部书稿的内容以及尚有可读的价值,我想引用几位最初审阅过论文的先生们的评价。

张德林先生在导师意见中写道:“我认为这篇论文有如下一些优点:①论文立意高,视野开阔,有鲜明的创新意识,突破了通常作家作品论单个文本分析的模式。论文紧密结合“五四”前后到三十年代这一段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语境,以思想启蒙和审美启蒙两大线索为引导,展示徐志摩与同时代多位中外大学者、大作家(梁启超、蔡元培、罗素、泰戈尔等)在互动关系中的人格魅力、艺术个性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种思想与艺术统一的综合比较研究方法落实在作家的个案分析中,前人很少有典范的成果,这篇博士论文有明显的突破,具有相当的开拓性;②史料翔实,每一个重要的立论都有充分的根据;③行文活泼流畅,富有灵气,可读性强。这在通常的博士论文中是不多见的。”

吴中杰先生的评价是:“本文作者视野开阔,超越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把徐志摩放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背景上,从思想启蒙和审美启蒙两条主线中加以考察,系统地研究了作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人格形成过程,将这一性格特征,渗透到作品分析和人生剖析中去,很有创见。文中对徐志摩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罗素)的精神联系的分析,对他所受梁启超影响的分析,都相当有深度。”

吴俊先生的评价是:“徐志摩研究并不冷僻,但在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真正综合性的成果却不多见,特别是像本文这样从启蒙和审美的双重线索上来考察徐志摩其人其作,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作者将对象作为一种文化和人格的典型个案来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在学术方法上也有着显著的示范价值,有助于推进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具体的创新成果主要是:①对徐志摩思想人格及其形成及发展的中西文化影响的分析和观点;②对徐志摩启蒙意义与价值的论述;③对徐志摩的自由精神与思想人格的悲剧性的分析;④对徐志摩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的论述;⑤历史的和比较的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等。”



其他几位先生“溢美之词”的评价,我就不一一摘录了。也许是由于导师的关系和诸位先生的宽容,我的这篇博士论文的答辩决议也类似上面的评价,得到了“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的总评。虽然有这些“门面”,但其实我深知,由于写作的仓促和阅读的局限,这还是一部“半成品”,研究有待深入。当年我想毕业后好好下点功夫,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写成一部日后不会羞愧的《徐志摩论》,甚至是《中国现代审美启蒙思想史》。但由于这些年繁重的教学工作、娶妻生子后的忙碌和自己的疏懒,这“半成品”就一放十一年。2012年我有幸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这才想到把它整理出版。翻开旧稿,发现很多惭愧之处,但庆幸的是其中的多数观点还没有“速朽”。本来想好好整理深化一番,不料我又被派至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从事汉语教学,手头没有什么资料,也只能稍加修改,凑合面世。遗憾是免不了的,但我在书稿中的真诚和努力还是能些许无愧于读者的。

感谢指点和帮助过我的先生师友们,他们的关怀和鼓励是我从事研究的动力,感谢我的父母家人给了我生活的安定与幸福,愿我的祖国和亲人好运平安。

胡建军 博士

2013年5月28日于加州洛杉矶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坐标系上的一颗星	1
第一节 历史的迷雾	1
第二节 “徐志摩现象”的思考	4
第三节 呐喊与歌唱	14
第四节 大鹏与夜莺	36
第二章 寻梦的激流	47
第一节 传统的血脉	48
第二节 徐志摩与梁启超	61
第三节 英雄崇拜	71
第四节 尼采——罗素——哈代	82
第三章 性格思想体系	97
第一节 与儒学生命理想的断裂	97
第二节 自然人格	102
第三节 徐志摩与蔡元培	120
第四节 爱情与友情	145
第四章 徐志摩的艺术世界与中国现代文化	164
第一节 “性灵”美学	164
第二节 志摩的艺术世界管窥	173
第三节 不倦的夜莺	184
第四节 历史照亮了志摩	187
结语 一道金色的光痕	193
主要参考书目	196

第一章

历史坐标系上的一颗星

第一节 历史的迷雾

“生活中存在着无数错误的可能性，存在着更多离奇古怪的行为，它们提出的过时的虚伪要比过时的真实更多。”^①寻找真实的历史何其之难！当我准备面对这位八十年前便已作古的历史人物，准备面对他所属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难以描绘的困境之中：在我与徐志摩及其历史背景之间，其实始终弥漫着一层浓重的雾霭，这是时间、空间、历史选择与历史诠释造成的，我称之为历史的迷雾。我知道只有自信已经穿透这层历史的迷雾，可以真真切切地与历史对象对话的时候，我才能获得描述与论证下去的自信，即使最终证明这迷雾是根本无法完全消除的。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有“史识”，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否则一出门就错了，结果肯定谬以千里。关于历史，人们很容易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淘汰”的过程，仿佛今天我们所见的历史只是时间长河千淘万沥之后所现的“精华”。用这样的观点看待文学作品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我们可以说，那些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古代或者近代的作品，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如果不优秀何以能流传百年、千年？只有那些经得起岁月冲刷的作品我们才奉之为“经典”。但用来看待历史就很成问题。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一种历史思潮的兴起，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表面上是充满“偶然性”的，实际上往往是一种“历史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并非是那么简单：“精华”的就留下，淘汰的一定是“糟粕”，“先进性”的事物才为历史所选择。在我看来，历史就是选择的历史。历史在其本身生成的当时，应该说是避免不了“偶然性”的，但此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而“选择”本身有一个复杂的生成机制。因此，当我开始研究徐志摩这个历史人物进而走进近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时，我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历史的选择”。

^① 伯特兰·罗素《不受欢迎论文集》，转引自《英国小语经典》，第13页，长春出版社，1993年版。



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都曾以自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表达了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如同一些方向不同的力,“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这种“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就是历史的选择。^②由此可见,历史的选择只是一种动态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并且它的运动仅呈现出单一的指向性,随后历史的车轮便只是在这“合力”作用下的单一向度上做歪歪扭扭的线性运动。需要思考的是,既然这选择是一种力的选择而并非价值选择,那么那些没有被历史所选择而曾经发生过作用的种种分力就不一定没有价值。而历史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某些在后人看来当时先知先觉、独特可贵的主张与思想却因为种种原因、种种力的作用,最终没有被历史所选择。一定有一些超越自身时代的思想与人物,注定被迫接受历史选择下的悲剧命运。比如说哥白尼、伽利略,又比如说马寅初、顾准。在历史的某个时刻,看来先进性的有价值的思想言论不一定就是最有影响的思想言论,价值与影响在历史的天平上常常并不均衡。换句话说,历史一方面选择了一种声音,放大了这种声音,同时也必定淹没掉更多的声音。很明显,那些曾经被历史淹没的种种声音和种种可能性,往往会随着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重新显出它的价值来,被后人所发现,在另一个时空里被历史选择。这被发现的原因和被选择的理由来自于时空变换。处于当下环境的人们,面对当下之现实困境与迷津,四下里探寻工具与出路之时,蓦然回首,却发现历史早已有答案,历史一定重演!在过往历史的进程中,前人可能面对相似的问题,前人的某些被淹没的对策,被错失的思想,在今日新时空新人新视角的观照之下突然“熠熠生辉”起来,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学习历史使人聪明,历史能给我们经验和教训。

我们不断地研究文学史,研究各种文学思潮和各类文学人物,看似是探索过去,实际上是为了“继往”和“开来”。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正如一切历史发展进程一样,也存在着历史选择的规律。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虽然没有被历史所选择,它所发生的历史作用长期被忽视,它曾经发出的声音被淹没在当时的历史之中。但在今日中国,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和探寻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出路的学术角度,重新审视近现代历史之时,就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我要求自己站在这种学术立足点上,重新研究启蒙思潮,重新阅读和发现徐志摩的历史价值,我也是在研究徐志摩与中西文化的关系、研究他所交往的“精神知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陈旭麓文集·第一卷·现代史两种》,第5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己”中,逐渐发现审美启蒙思潮的线索的。

我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实际存在一种被淹没的启蒙思潮——“审美启蒙”,徐志摩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之所以没有选择这种思想方向,也许是因为徐志摩等人当年受西方文化灵感而生的“审美启蒙”思想,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过于超前,过于理想,过于慢效,不像“思想启蒙”那样是立竿见影的猛药,所以才会成为孤独的“星星之火”,燃不起“思想启蒙”那样大的“燎原”火焰,只能在漫长的冬季里“低语”。然而在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语境下,随着人们对各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的忧虑与反思,随着人们对软实力、软环境以及全民族素质的重视,随着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探索,“先知先觉”的徐志摩们开始重新引起我的注意。我想,时代的劲风应该要把“审美启蒙”的星星之火点燃,用艺术教育和提高审美能力的手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应该要有燎原之势了;“审美启蒙”的芽,终于要在这个季节里尽情生长了。但是,我对今天的现实选择也有自己的担心:也许金钱崇拜和消费文化的烟尘又要掩盖徐志摩等人当年的声音了,因为消费主义思潮之强大仿佛又会把历史的马车带向歧途,让人不安的是连徐志摩本人的生平事迹也已经成为“消费品”之一了。我担心审美启蒙思潮会不会又被淹没?在这种观察和思考下,重新阅读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徐志摩、胡适、朱光潜、沈从文、宗白华、钱钟书等人的作品,发掘他们的思想与影响他们的中西文化精神的种种联系,重建与“审美启蒙”、“文化启蒙”思想者对话的桥梁,探索医治当今社会病态的良方,以期达到“有益于时”、“有补于世”的“野心”,是促使我开始徐志摩研究的内在动力。我相信在那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提升的极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如果有可能,我愿意重唱他们的歌,重走他们的路。

整理这本书稿时,我偶然读到南怀瑾先生这样一句话:“今古学术知见,大概都是时代刺激的反映,社会病态的悲鸣。”^①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又见梁启超先生云:“既以见学术之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巨,且以见治古学者之当周于世用也。”^②因此人文学者研究历史似乎往往都胸怀一种“救世”理想,那也许就是他们展开研究的内在动力。我想我这样去开始研究应该是路没走错,虽然明知自己的学识浅薄,但走下去的信心还是有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探索历史就是为了现在的现实和将来的现实。这样看来,徐志摩研究所引发的思考,就不不但具有文学史本身的价值,更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

① 《南怀瑾选集·第一卷·论语别裁》,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梁启超文选下·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31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我的论述将始终着眼于这两点价值探寻展开。

历史的迷雾还使我联想到历史本身和历史阐释。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断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的长河不也一样具有这种不可重复性？历史就是一个在时间的纬度上不断流逝，在空间的纬度上不断阐释的过程，因而绝对完整和客观的再现历史是无法做到的。在此意义上，我要研究的文学史人物——徐志摩，他短暂的一生、他身后巨大的历史变迁以及史料的散佚，都使他的生命痕迹随时间长河的流逝而淡漠了许多，甚至在今日，徐志摩仅仅缩小成了一个简单的“浪漫”符号。徐志摩留给世间的宝贵的人生态度、人格实践、思想文化主张、艺术创造的文字、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面的丰富贡献，本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之精神资源的那些具体要素，却被动荡与躁动的时代冲刷掉了。因而复原真实的徐志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此外，“历史是客观世界的运动，也是主观世界的记录，记录与运动之间从来不是珠联璧合的，只有比较近似和很近似”，^①也就是说历史都是受现实支配的人写的。既然历史是一个站在阐释主体面前的阐释对象，那么阐释主体的现实基点（阐释主体的主观性和当代性，甚至还有难以避免的个性化与片面性）就多多少少影响了历史的阐释，也就是说我所能读到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阐释。因此在研究的起点，对于那众多的有些是大相径庭的近现代文学史著作，我必须努力炼就治史的眼光，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对林林总总的阐释先分辨判断。我的态度是不能不信，不能全信。历史可以阐释，但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我如同一个画师，去画一个不曾见过的先人，只能在可信的间接的描述中绘成自己的“腹稿”，然后以我的理解和画功完成他，至于史料和史实是否可信，就只有“拿证据来”了，我只求不随心所欲地解释史料或者歪曲史实就好。徐志摩虽然吸引着我，使我跃跃欲试，但初初学画，我能否写出我眼中的志摩，画出我心中的志摩，我并不能保证什么，我只有真诚和用心而已。

第二节 “徐志摩现象”的思考

讲述徐志摩只能从历史推向现在，思考和研究徐志摩则是从现在追述历史。我对徐志摩的研究就是从思考“徐志摩现象”启程的。“徐志摩现象”是我对当代中国社会现象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思考，是对徐志摩的文化影响以及徐志摩研究的一种看法。在我看来，“徐志摩现象”不但是徐志摩在中国的命运变迁，而且是审美启蒙思潮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命运在现代中国的一个注脚。这是一种典型的历

^① 《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史现象,透过这种现象,不但可以把握逝去的那段历史和那个时代,而且可以深入解读徐志摩本身。

“徐志摩现象”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徐志摩的“热”——“冷”——“热”的变化线索。志摩的一首爱情诗《偶然》^①很能在这个层面上给我们某些启示: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样一首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小诗，表面上只有“云”意象与“湖”意象简单关系的画面，但其意象的隐喻映射方向却又是那样不确定，除了爱情中某种微妙情绪的隐喻之外，是不是还可以隐喻其它？如果我们套用隐喻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更清楚了。美国语言学家布莱克(Black)认为，有些隐喻是以原先人们已知的相似性为基础的，有些却是在使用了隐喻后，才在人们认识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似性认识的。^② 在这里，我们发现隐喻的始源域(云与湖关系)与目标域(爱情)之间的相似性是很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但这种相似性并不唯一，一旦始源域确定，目标域就不局限于“爱情”了，读者还可能在“云投影于湖”的意象体味中发现新的相似性关系。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一般，作者的真实情思在诗中似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读者所能捕捉的只有朦胧意象结构而成的悲剧画面，体验那震撼心灵的怅然若失、淡淡哀愁与几分无奈交织的感受，沉浸于诗中空灵的意境。因为这些似乎都与表达爱情颇为贴切和传神，于是多数读者读出了爱情，但有些读者却在李商隐的“政治上的不得志”与那些悲剧性画面之间建立起新的相似性。我在徐志摩的这首爱情朦胧诗里也读出了

① 《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全集·诗集》，第215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②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94.



另一种新的相似性关系,这首诗其实也暗喻了志摩与历史的一种关系。我认为这首《偶然》恰恰象征了徐志摩与历史选择之间偶然相遇,交汇着放出光亮,然而很快又擦肩而过,消失在历史前行的海面上的情形。

在群星闪耀的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只是一颗孤独的彗星,他有他自己的轨道,在与历史的选择交相辉映的刹那,他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一颗闪耀的明星,成为“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说到“五四”的文化英雄,应该说有两类,各有偏重,一重在“破”,一重在“立”。前者是以“摧毁”和“废除”为主的现代知识分子,可以称作“激进派”。他们在热情拥抱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同时,倾全力摧毁中国旧道德和旧思想的禁锢,采取“批判”的姿态,对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方面,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于激进与绝对,日后反思“五四”时,人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某些缺失和流弊;后者是更多以“建设”和“倡导”为主的那些知识分子,可以称作“保守派”。他们采取“倡导”的姿态,着力于探索、实践和建设新文化、新文学。徐志摩便属于后一类。那个“凤凰涅槃”的时期偶然间照亮了他。

志摩成名的历史背景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在专制政权土崩瓦解,中国学习建立现代国家刚起步的当口,政府控制力非常有限,而知识精英阶层异常有力的时代,正是现代中国文化真正“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生长期,这一代知识精英生逢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中国社会急剧新陈代谢的结果,是近代启蒙运动发展与封建旧文化决战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西学是火种和武器。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知识界提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开始,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论和文艺思想就成为冲击封建旧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的精神武器。“五四”时代正是西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活跃时代,20 世纪 20 年代也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这时的志摩遇流而走上文化舞台,不但以他抒情浓郁、才情熔铸的西体诗歌振兴了新诗坛,不但以他积极参与中外文化交流,主编副刊、创办杂志、创立文学社团、推动新戏剧等心无旁骛地投身各类文化事业的活动,推动着新文化的发展,更以他的西学背景、西方绅士的做派、西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审美启蒙的文学主张,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大力推介所掀起的新鲜西风,树立了自己的新派文化名人形象,加之志摩与梁启超、胡适这样在当时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的密切关系,使得志摩的成名几乎是不可避免。他是欧风美雨时代的潮头健儿,时代照亮了他,他也照亮了那个时代。他是一只只在西方孕育而生的夜莺,在爱情的沐浴与催化下开始不停地歌唱,歌唱自由的价值、人道的理想和美的梦幻。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转引自《陈旭麓文集·第二卷》,第 540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中外诗人和作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阅读刺激型作家。他们是被动的，看别人的作品多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那种。我不太欣赏这类作家诗人，他们似乎是学者型的作家，阅读的刺激往往是他们写作的灵感，往往是别人的创作成为自己创作的由头。我认为这类人写作实际上也是在“阅读”，当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最大的问题是把写作与阅读搞到了一起。我比较欣赏另一类作家。他们是生命敏感型的作家，本身的人格就是诗性的。尼采和崇拜尼采的徐志摩便是他们的代表。心灵仿佛敏感的琴弦，生命律动的阵阵微风，不管是飞鸟与池鱼，还是星光与田野，只要是生命在动，心灵也会跟着起舞，情感往往如泉涌一般，不期而遇又不得不发，赋予他们创作灵感与冲动。他们并非不读书，只是从不依赖阅读的刺激来写作，他们是心灵主动型的作家。尼采说：“当我埋首工作时，在我的四周是看不到书本的，我小心地不让任何人在我的面前说话甚至思考。”^①同样，徐志摩这个人首先是诗性的，才有了他那真纯的诗文。志摩“浓得化不开”的人格成就了他的“浓得化不开”的诗文，这使志摩成为少数真正“纯粹”的诗人之一。

徐志摩真纯的人格、诚笃的理想与文艺复兴的热情曾经那样光彩夺目，他的诗名与诗才曾经那样盛极一时，但随即如流星一闪，“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历史的变迁、历史选择的方向之变与这颗彗星的轨迹擦身而过。历史演进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军阀割据，政治混乱，这是一个现代思想与落后保守势力激烈交锋的时代，是一个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不断争雄消长的时代，是一个左翼文学与专制文化对垒分治的时代，因此革命与斗争必然是那一时代的主要旋律。历史选择了具有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鲁迅，与此同时文学也进入到左翼文学时代。追求理想，主张改良、自由、宽容、妥协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审美启蒙的主张都失去了现实有力的基础。因此从志摩意外去世直到 40 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他似乎已被历史置于遗忘的角落；50 年代是无产阶级文化时代，他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短暂的“百花齐放”只给徐志摩投射了些许微光，^②但随后就是极左时期的封杀。改革开放时期，徐志摩才真正被研究和传播，徐志摩才逐渐“热”起来。这其实也是历史的选择。时代发展到今天，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进程稳健发展，整个中国社会进入改革与开放的时代，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时代的变迁使得文学革命的主题已经让位于文学建设；世界民族国家的竞争，又使得文化建设的使命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素质的主题，这一视点的转移，加之伴随发展经济与社会转型而来的精神危机，使得那些歌唱中西文化交流，鼓吹审美启蒙和民族精神改良的声音和人物重放光彩，他们曾经努力和付出的一切，成为

① 刘焯编译《尼采生存哲学》，第 23 页，九州出版社，2003 年版。

② 《赵家璧序》，《徐志摩全集·诗集》，第 23 页，上海书店，1988 年版。



我们今天的巨大财富,他们的往事、人格与思想开始引发我们的思考与崇敬。

同历史的选择相比,历史的误读则往往更加粗暴。徐志摩在文坛上活跃的 10 年正是新文学建设刚起步的年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和文化战场的年代,他的文学尝试、社会理想、文学观念、生命追求和历史命运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与胡适一样是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而在长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徐志摩始终是被排斥和忽视的,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教材上他只是作为反动文人存在;而在中国港台地区他的爱情生活则更受关注。无论哪一方面都很少有人去全面阅读徐志摩的所有作品及其相关资料,很少有人对于徐志摩给予学术上的全面解读与公允评价,更不用说去发现徐志摩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了。对徐志摩的研究始终处于非系统的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开放心态和开放脚步的成熟,使得西学又一次大规模“东渐”,又一场更猛烈的欧风美雨的来到,使得徐志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历史轨迹的改变与志摩这颗孤独彗星的恒长轨迹越来越近,“交相的光亮”已经显现,对志摩的重新阅读已经开始。

以上关于徐志摩在中国的命运的粗粗勾勒,就是所谓“徐志摩现象”的一方面。从我的描述中读者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徐志摩在中国的命运是和现代艺术与现代审美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一致的;也是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张扬自我的精神在中国的命运相一致的;更是和国民精神改造传统在中国的命运相一致的。其实“你记得也好”,“忘掉”也罢,志摩依旧是志摩,他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时代。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家始终沿自己的轨道运行,才有可能与历史的选择重新交会。

“徐志摩现象”的第二个问题是大众对徐志摩情爱生活持久不衰的兴趣,从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到书架上各种各样的徐志摩情爱逸事书籍,以及常常出现在各种娱乐节目、影视人物对白中的徐志摩诗句,一时间形成所谓的“徐志摩热”。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热”,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志摩本身艺术化人生的魅力的必然结果。人们在他的人生中发现了某种理想,某种戏剧性,甚至产生移情作用。另一方面是志摩的西方式的浪漫爱情史、爱情至上观和个性张扬迎合了人们的个性解放心理。一个被各种束缚与说教压抑、禁锢了太久的民族,当环境日益宽松之时,免不了有“饿补”的冲动,往往对浪漫情爱有更多的好奇和向往;也许还使消费文化从中发现了可以迎合“贵族式”物质生活理想,迎合“第三者”和喜新厌旧者的心理;或者徐志摩身上的个性与他的奇特经历,他的“艺术化的人生”具有典型性、传奇性和戏剧性,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但人们却大大忽视了历史背景,也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徐志摩,因而忽视了志摩婚姻观的“超前”最根本的思想原因是什么。“爱”是徐志摩思想信仰中的重要内涵,在他看来只有真爱情才有真幸



福,在此基础上才能造福人类,实现改良社会大业。在徐志摩的思想中,对个人真爱情的追求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他把没有爱没有自由的家庭看作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①因而这里的志摩展现的并非“柔”的一面,而是“刚”的一面。志摩的离婚再娶,虽然遭到其师梁启超的反对和苦口婆心的劝导,^②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但他却毫不退缩,“我之所以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③因此,徐志摩在张幼仪那里、在陆小曼那里,都做出了勇敢的举动。先是开中国人现代离婚形式的“先河”,再在《浙江潮》上堂而皇之地登出“宣言”,从爱情婚姻论到个性解放。之后又公开追求陆小曼并与之公开举行婚礼,表现了“甘冒世之不韪”的斗争勇气;同时离婚后又与前妻保持着友谊。志摩此类举动,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被人传为佳话,令人起敬。在今天看来,徐志摩才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五四”精神的,才是传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畏精神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这个反封建的“斗士”,以及与志摩同为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都在个人反对封建婚姻方面有着太多的顾虑和犹豫,甚至给人无奈与懦弱的印象,当然也免不了招致后人的非议。志摩也不像郭沫若与茅盾,后二人在感情方面似乎显得绝情、自私与冷酷,根本与反封建无关。

不管影视界、出版界的“徐志摩热”怎样蓬蓬勃勃,文学研究中的“徐志摩热”并未真热,而商业炒作中的“徐志摩热”并非缘于一个完整真实的志摩,而恰恰是关于徐志摩误读的一部分。我觉得过分渲染徐志摩生命中的某一部分,忽视另外的内容,必然会造成人物解读的扭曲和误会。从生活和感情的角度切入,观察徐志摩的处世风格和人际关系,自然是重要的,但从港台到大陆,热衷于徐志摩的情爱生活,过分注意徐志摩的浪漫情怀,几乎成为解读志摩的主导方面。殊不知不自觉间已经忽视了志摩身上那些同样重要的内涵,比如他超前的现代思想和艺术观,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和理性追求,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和启蒙思想,他对现代中国文化事业多方面的贡献。这些重要质素的缺失,实际上是对徐志摩形象真实性的篡改,这和文学研究中过分局限于徐志摩的“诗人性”和“诗”一样是片面的,不公正的,有害于把握徐志摩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总之,这种“徐志摩现象”对徐志摩研究是一种干扰和挑战,研究者必须给大众一个符合史学特征的徐志摩,一个对当代文化更有启示和建设意义的志摩。

① 胡适《追悼志摩》,《新月月刊》1932年3月第4卷第1期,转引自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第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梁启超《给徐志摩的信》,《徐志摩全集·第一辑》,第133-13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徐志摩全集·补编·书信集》,第7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实际上徐志摩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英雄,他的超前虽然使他在那个时代显得孤独和寂寞,但也使他在今天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但是他的艺术,更是他的艺术的底质、他的思想使然。徐志摩的超前有些在今天还是前卫的。比如他提倡的精神生活的理想,把美和美的创造看作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在艺术创作和推进艺术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努力;比如他对完美人格的执著追求以及主张宽容和反对绝对主义的精神;再比如在启蒙方面:志摩对人性弱点的态度,与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对于人性的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在内,都采取愤激批判的态度,关注的是个体的恶以及民族劣根性。他们往往批判多而解决办法少。实际上,消极的批判并不能代替积极的办法;志摩则接受了罗素的心理、伦理分析观点,他并不看重严厉的批判,他更关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徐志摩始终认为解决社会弊端的根本方法就是营造理想的社会伦理,创造美的艺术,倡导“真”与“美”的“健康”的社会理想,最终以改造了的社会伦理去改造个人。只有当每个个体成为精神健康有道德的人,这个社会的弊端就解决了。虽然志摩的理想与中国现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和矛盾,虽然志摩的理想在当时没有条件实现,但他那“海滩上种花”^①的精神使他更像一位跳高选手。我以为那些跳高选手都是悲剧英雄,虽然他们的最后结果总是在一个高度上摔下来,失败总不可避免,但他们达到的每一个新的高度,都是一种胜利,是人类的骄傲。徐志摩这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跳高英雄,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思想的新高度,他也达到了自己人生力所能及的高度,令人钦佩,令人羡慕。那个时代也因为有了徐志摩这类超前型的人物,有了徐志摩这种超前的思想而显出了耀眼的光彩。所以徐志摩的悲剧更具有悲壮美,如同为人间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和追逐太阳的夸父一般,他的理想与失败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和深思。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徐志摩,把以鲁迅所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参照,由徐志摩出发,向前后探寻,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发现:现代思想史上实际存在着最终指向一致的两种启蒙,即思想启蒙和审美启蒙。如同一支多元的文化队伍,分作两翼,互相策应,改变着现代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巨轮。然而这两种启蒙的命运却不同,前者是被历史照亮的,后者则被历史湮没。“中国的文艺复兴”、“美育”、“精神生活”、“艺术化人生”等词汇背后站立着一个个审美启蒙的耕耘者和现代文化事业建设者。他们是由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徐志摩、朱光潜、宗白华、沈从文、钱钟书等人代表连起的一条审美文化启蒙的线索,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他们的主体。他们这些人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民较高水准的民族文

^① 《海滩上种花》,《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乙集》,第133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这篇散文和这个题目最能表现志摩的理想主义。